

# 国家级新区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

## ——理论机制与经验辨识

郑维伟<sup>1</sup> 刘耀彬<sup>2,3,\*</sup> 陆海空<sup>3,4</sup> (1.重庆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重庆 400044; 2.南昌大学 中国中部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江西 南昌 330031; 3.南昌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4.浦发银行 深圳分行,广东 深圳 518000)

**【摘要】**探讨国家级新区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制,采用广义合成控制法评估其政策效应大小,运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对其作用机理展开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国家级新区总体显著地驱动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设立于东部地区、正厅局级以及2013年以前的国家级新区政策效应更加明显。国家级新区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不存在时滞性,且通常拥有8年的政策时效性。中介效应分析进一步表明,相较于带动地区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国家级新区主要通过就业结构优化和生态环境改善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可见,在后续国家级新区批复设立和推进过程中,一方面,需要给予中西部地区更多的关注和引导;另一方面,需要注重发挥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推动作用,最终实现中国区域均衡协调和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国家级新区;高质量发展;广义合成控制法;作用机制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截至2020年底,中国已总体形成以“8东+2中+6西+3东北”为基本格局的国家级新区批复进程。2015年4月,国家发改委等联合印发《关于促进国家级新区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着重强调国家级新区作为承担国家重大发展和改革开放战略任务的综合功能区,需在促进经济发展、扩大对外开放及推动改革创新等方面发挥重要引领作用。《2018中国国家级新区营商环境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前18个国家级新区地区生产总值已趋近4万亿元,占全国地区生产总值5%的份额,其中,上海浦东新区等11个国家级新区地区生产总值更是达到千亿元规模。可见,国家级新区正逐渐发展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强有力的增长引擎。

从现有研究看,已有较多学者证实了国家级新区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sup>[1]</sup>、产业结构升级<sup>[2]</sup>以及全

要素生产率提升<sup>[3]</sup>等方面所显示出的“政策红利”。然而,在经济新常态和强调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背景下,如若仍然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忽视质量,将会引发经济增长低效益、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及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等一系列问题,不利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sup>[4]</sup>。

因此,国家级新区究竟是否有利于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同区域、不同行政级别及不同批复时间的国家级新区是否存在显著的政策效应差异?进一步地,其究竟通过哪些渠道作用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实现?本文通过构建31省市2000~2018年面板数据,运用广义合成控制法实证检验国家级新区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效应及其潜在的空间异质性,并就其影响机制展开探讨,以期今后国家级新区规划布局和加快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现实佐证。

### 1 相关文献回顾与理论机制

#### 1.1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

从内涵上讲,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综合了区域经济发展、社会与政治进步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复合概念。然而,学术界并未对其本质内涵达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绿色发展绩效评估与美丽中国建设道路研究”(18ZDA04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坚持绿色发展的技术路线、区域实现及政策工具选择”(2015AZD070);全国“四个一批”人才项目(中宣字[2016]49号)

\* 通讯作者:刘耀彬(1970-),男,湖北麻城人,南昌大学副校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南昌大学中国中部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城市经济与生态经济。E-mail: liuyaobin2003@163.com。

成一致。李金昌等从经济活力、创新效率、绿色发展、人民生活以及社会和谐等5个方面综合构建了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sup>[5]</sup>；唐晓彬等从经济稳定发展、创新驱动水平、协调发展水平、生态环境水平等六个维度构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sup>[6]</sup>；聂长飞和简新华提出从产品和服务质量、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运行状态等“四高一好”5个层面评价区域发展质量<sup>[7]</sup>。综上，本文认为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社会发展程度、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程度等均是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表现形式。

### 1.2 国家级新区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制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研究，本文认为国家级新区主要从带动地区经济增长、就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生态环境改善等四个方面综合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图1)。

第一，通过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形成经济增长极。地方政府通过国家级新区寻求政策倾斜的同时，将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业用地供给、税收优惠政策、重大项目审批、先行先试特权和为企业提供“高标准、低成本”空间载体<sup>[8]</sup>等方面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从而汇集劳动力、资本、高新技术人才和信息等资源要素<sup>[2]</sup>，通过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构造资源空间异质点，实现企业生产经营优化和降低生产成本，驱动经济增长<sup>[9,10]</sup>。

#### 第二 通过生产效率提升和新兴产业发展诱导

就业结构优化。一方面，国家级新区推行的人才引进、科技创新等制度创新措施以及科技创新园区平台搭建等政策支持，有利于吸引高新技术企业科研人员集聚。在组织学习框架下，通过知识和技术外溢的正外部性，加快企业科技创新<sup>[1]</sup>，实现劳动力边际生产效率提升、产品生产成本和价格下降，引发“消费—生产”进入新平衡<sup>[2]</sup>，引发企业生产规模扩大和劳动力需求上升，促使就业规模和结构变化。另一方面，受国家级新区打造区域改革创新新样板、中心城市转型升级新引擎和统筹城乡发展新载体等战略定位制约，其实行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政策等均明显倾向于高新技术产业。综上，通过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效率提升，有利于国家级新区增加相关新兴产业的劳动力需求，最终实现就业结构优化。

第三，通过创新能力提升和主导产业转型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首先，随着国家级新区集聚效应不断加强，有利于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关联、加快人才和信息流动扩散以及实现行业内企业、生产和服务供应商等空间集聚，最终调整地区产业结构<sup>[11]</sup>。其次，随着地区“消费—生产”达到新平衡，可以刺激相关配套服务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消费需求；同时陆续淘汰传统低技术低附加值产业，综合实现地区产业结构升级<sup>[2]</sup>。最后，国家级新区对发展高新技术和低碳型产业的政策倾向，同样有助于推动其内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 第四 通过环境保护规制和清洁生产技术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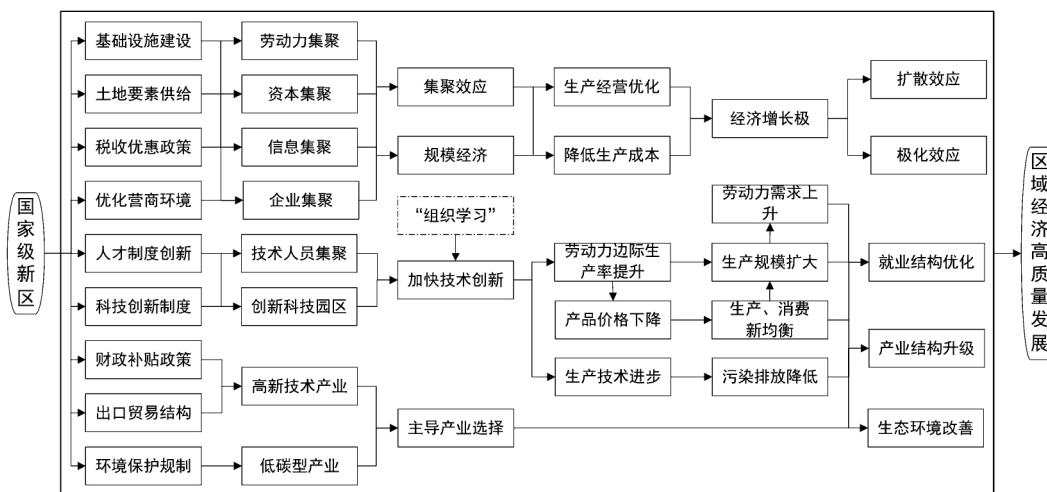


图1 国家级新区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作用机理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绘制

绿色发展。从现实要求看,国家级新区具有打造成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和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的“绿色生态”样本需求。随着资本、高新技术等要素集聚,可以加快生产技术创新以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同时,环境保护规制引致产出更多向高生产率企业配置,有利于企业间资源优化再配置,最终达到生态环境改善的预期效果。

需要说明的是,国家级新区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并非一定是积极的。换句话说,如若国家级新区过度吸收周边地区的要素资源,且其扩散效应弱于极化效应,则往往会出现“以邻为壑”(Beggary-thy-neighbor)现象<sup>[12]</sup>。事实上,不同国家级新区很可能受地方政府对国家级新区建设的关注程度及执行力度<sup>[13]</sup>、不同行政级别导致的初始发展条件和稀缺资源配置差异<sup>[8]</sup>以及设立时间早晚的“政策红利”差异<sup>[14]</sup>等影响导致政策效应异质性。

## 2 方法、指标与数据

### 2.1 广义合成控制法

为有效克服双重差分模型以及倾向得分匹配等传统政策评估方法无法避免政策内生性等局限,Abadie 和 Gardeazabal 提出了基于“反事实估计框架”的合成控制法<sup>[15]</sup>。然而,由于合成控制法每次只能处理一个政策实施对象,不适用于类似本文研究多个国家级新区在多个政策发生时期的综合政策效应。此后,Xu 将交互固定效应模型与合成控制法相结合,提出了一种适用于多政策实施时点下多政策实施地区综合政策效果评估的广义合成控制法(GSCM)<sup>[16]</sup>。理论上,GSCM 既相较于传统计量方法放宽了平行趋势假定,又较合成控制法估计结果更加高效,具有明显优势。该方法基本设定如下:

假设可获得  $N$  个地区在样本期内的观测结果变量  $y_{it}$ ,  $T$  和  $C$  分别表示处理组和控制组单元集合。其中,  $N_T$  个地区在  $T_0$  期设立了国家级新区,将余下  $N_C$  个截至样本期仍未推行国家级新区的地区作为潜在控制组样本库,得到如下模型:

$$y_{it} = \delta_{it} D_{it} + x_{it}' \beta + \lambda_i' f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D_{it}$  为各地区设立国家级新区的虚拟变量;  $\delta_{it}$  衡量了地区  $i$  在  $t$  时期的异质性政策处理效应;  $x_{it}$  为  $(k \times 1)$  维可观测到的协变量;  $\varepsilon_{it}$  为随机扰动项。

为简化表述,可将式(1)改写为向量形式:

$$Y_i = \delta_i \cdot D_i + X_i \beta + F \lambda_i + \varepsilon_i \quad (2)$$

根据式(2)可知,每个控制组地区  $i$  的数据生成过程为  $Y_i = X_i \beta + F \lambda_i + \varepsilon_i$ ,故所有控制组的数据生成过程为:

$$Y_C = X_C \beta + F \Lambda_C' + \varepsilon_C \quad (3)$$

其中,  $Y_C = (Y_1, Y_2, \dots, Y_{N_C})$  与  $\varepsilon_C = (\varepsilon_1, \varepsilon_2, \dots, \varepsilon_{N_C})$  为  $(T \times N_C)$  维矩阵,  $X_C$  为  $(T \times N_C \times p)$  维矩阵,  $\Lambda_C = (\lambda_1, \lambda_2, \dots, \lambda_{N_C})'$  为  $(N_C \times r)$  维矩阵。

值得注意的是,当  $D_{it}$  分别取 1 和 0 时,令地区  $i$  在  $t \in [T_0, T]$  期的结果分别为  $Y_{it}(1) = \delta_{it} + X_{it}' \beta + \lambda_i' f_t + \varepsilon_{it}$ ,  $Y_{it}(0) = X_{it}' \beta + \lambda_i' f_t + \varepsilon_{it}$ 。因此,国家级新区所引起的第  $i$  个地区在  $t$  时期的政策效应为:

$$\delta_{it} = Y_{it}(1) - Y_{it}(0) \quad (4)$$

然而,对于式(4)估计的实现还存在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即当  $t \in [T_0, T]$  时,虽然衡量国家级新区政策的观测结果变量  $Y_{it}(1)$  可直接获取,却无法直接观测得到“反事实”情况下未批复设立国家级新区的观测值  $Y_{it}(0)$ ,故为估计政策处理效应  $\delta_{it}$  需先估计得到  $Y_{it}(0)$ 。

对此,Xu 提出了如下估计思路<sup>[16]</sup>:首先,根据留一法交叉验证(Leave One Out Cross-Validation),计算不同因子个数下的均方预测误差(MSPE),根据 MSPE 最小化原则准确识别最优因子个数  $r^*$ 。

其次,仅利用控制组数据进行交互固定效应模型估计,通过求解最小化目标函数(5)得到估计结果  $(\hat{\beta}, \hat{F}, \hat{\Lambda}_C)$ :

$$(\hat{\beta}, \hat{F}, \hat{\Lambda}_C) = \operatorname{argmin}_{\beta, F, \Lambda_C} \sum_{i \in C} (Y_i - X_i \beta - F \lambda_i)' \times (Y_i - X_i \tilde{\beta} - \tilde{F} \tilde{\lambda}_i) \quad (5)$$

s.t.  $\tilde{F}' \tilde{F} / T = I_r$  且  $\tilde{\Lambda}_C' \tilde{\Lambda}_C = \text{diagonal}$

再次,仅使用处理组,通过最小化处理组政策实施前的 MSPE,估计每个处理组的因子载荷  $\hat{\lambda}_i$ :

$$\hat{\lambda}_i = \operatorname{argmin}_{\lambda_i} \sum_{t \in C} (Y_i^0 - X_i^0 \hat{\beta} - F^0 \lambda_i)' \times (Y_i^0 - X_i^0 \hat{\beta} - F^0 \lambda_i) = (F^0' F^0)^{-1} F^0' (Y_i^0 - X_i^0 \hat{\beta}) \quad (6)$$

其中,  $\hat{\beta}$  和  $F^0$  由式(5)估计结果获得,上标“0”表示国家级新区设立前的时期。

然后,根据式(5)和(6)估计的  $\hat{\beta}$ 、 $\hat{F}$  和  $\hat{\lambda}_i$ ,得到处理组在国家级新区设立后的“反事实”对照组:

$$\hat{Y}_{it}(0) = X'_{it}\hat{\beta} + \hat{\lambda}_i \hat{f}_i \quad (7)$$

最后,将  $\hat{Y}_{it}(0)$  作为  $Y_{it}(0)$  的无偏估计量,可估计得到式(4)所表述的政策效应大小。同时,可进一步计算国家级新区政策的平均处理效应:

$$ATT_t = \frac{1}{N_T} \sum_{i \in T} (Y_{it}(1) - Y_{it}(0)) = \frac{1}{N_T} \sum_{i \in T} \delta_{it} \quad (8)$$

需要说明的是,平均处理效应估计量  $ATT_t$  的标准误通过参数 Bootstrap 方法估计得到。

### 2.2 指标及数据来源

根据相关研究成果<sup>[18,17]</sup>,本文共选取区域高质量发展指数、地区生产总值、专利受理数、城镇化水平以及公路里程数等 10 个宏观经济指标。其中,区域高质量发展指数基于本文所构建的区域高质量发展指数指标体系(表 1),运用熵权

TOPSIS 测度所得。

鉴于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批复设立时间较早,其发展目标和重心在于整合资源以实现经济增长,对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注度并不高。因此,本文最终选取除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以外的 17 个国家级新区作为研究对象,相应样本期为 2000~2018 年。需要说明的是,为消除物价波动影响,对除比值外的所有以货币统计数据均以 2000 年为基期,使用 CPI 进行平减;为消除异方差和便于系数的经济解释,对除比值外的各评价指标均做取自然对数处理。其中,相关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EPS 数据库和各省统计年鉴,选取各项指标及其描述性统计见表 2。

表 1 区域高质量发展指数指标体系

评价维度	经济含义	具体指标	单位	指标属性
经济发展质量	地区经济发展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正
	经济发展结构	二三产业产值占 GDP 比重	%	正
社会发展程度	社会科技进步	专利申请受理数	件	正
	社会教育水平	普通高中毕业生数	万人	正
	社会文化建设	公共图书馆数	个	正
	医疗卫生条件	医疗机构床位数	万张	正
城市发展水平	城镇化水平	城镇总人口/地区总人口	%	正
	基础设施建设	公路里程数	km	正
生态环境质量	森林绿化面积	森林面积	万 hm <sup>2</sup>	正
	空气质量	SO <sub>2</sub> 排放量	万 t	负
	水环境质量	工业废水排放量	万 t	负

表 2 各项指标描述性统计表

变量名	指标含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quality	区域高质量发展指数	589	0.255	0.101	0.037	0.580
lngdp	地区生产总值取对数	589	8.733	1.161	4.769	11.080
indus_str	二三产业产值占比	589	0.877	0.065	0.636	0.997
lnemploy	社会总就业人员取对数	589	7.409	0.929	4.815	8.706
employ_str	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	589	0.577	0.150	0.261	0.548
lninvest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取对数	589	8.180	1.252	4.160	10.553
lnbudget	一般财政预算支出取对数	589	7.094	1.030	4.094	9.258
lnpatent	专利受理数取对数	589	9.304	1.881	2.708	13.585
czh	城镇化水平	589	0.496	0.160	0.188	0.937
lnmile	公路里程数取对数	589	11.310	0.894	8.712	12.712

## 3 实证结果分析

### 3.1 综合政策效应分析

本文采用广义合成控制法,通过合成得到国家级新区所属地区在政策实施后的“反事实”对象,以

检验国家级新区是否有利于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sup>①</sup>。实证结果表明,其真实值与合成值的成长路径的确存在显著差异(图 2)。

首先,国家级新区所在地区区域高质量发展指数合成效果总体较好。国家级新区设立前,区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真实值与合成值非常接近,说明“反事实”对象对该地区拟合程度较好。其次,国家级新区总体显著地驱动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合成地区相比,国家级新区设立后,其真实值始终处于合成值上方。经计算得到其综合政策平均处理效应为 0.0128,说明国家级新区对所在地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提升的确带来了正向影响。最后,国家级新区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具有明显的“政策先行”和时效性特征。一方面,自批复设立当年起,国家级新区便在 95%

的置信水平下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出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这与地方政府为成功获批国家级新区,往往会就国家级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吸引投资和形成产业集聚等方面提前做出规划,通过发挥引领示范效应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预期一致。另一方面,从国家级新区设立后历年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情况看,其整体发挥着正向促进作用,且呈现出先增后减的政策效应,直到第 9 期以后才不再显著,即通常拥有至少 8 年的政策时效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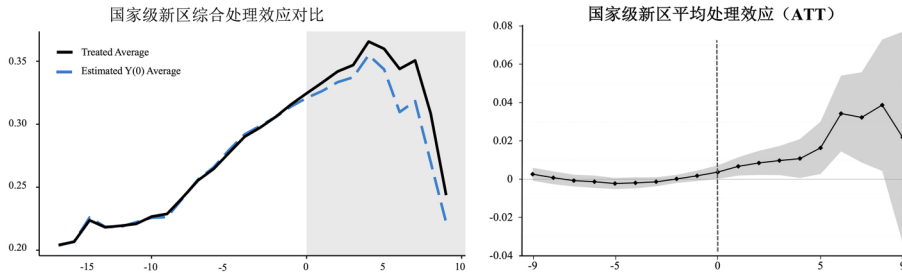


图 2 国家级新区政策下真实区域与合成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变化图  
注: 横轴代表国家级新区设立前后相对期数, 右图中阴影为 95% 置信区间, 下同。

### 3.2 政策效应异质性分析

由于国家级新区所属地区“母城”能否提供强大的经济辐射能力、不同行政级别初始发展条件和稀缺资源配置区别,以及设立时间早晚带来的“政策红利”差异等均可能导致其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因此,有必要从以上三个层面深入探讨其可能存在的政策差异。

首先,设立于不同地区的国家级新区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图 3)。尽管不同所属地区的国家级新区政策平均处理效应均处于 0 值上方,即整体均能够有效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然而,对比发现,无论是政

策效应大小还是显著程度,设立于东部地区的国家级新区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均明显更优于中西部地区。可能的原因在于本文所探讨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是一个综合了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社会发展程度、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程度的复合概念。不可否认,东部沿海地区无论在经济、社会、城市,还是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发展基础和水平均明显更优于中西部内陆地区。因此,通过在东部地区设立国家级新区,可以凭借其更好的初始发展条件,有效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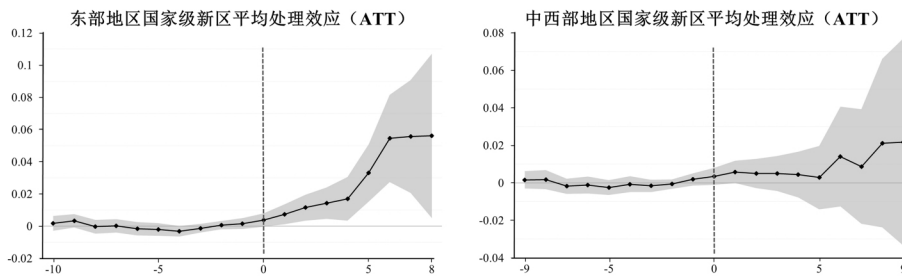


图 3 不同所属地区国家级新区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平均处理效应

其次,不同行政级别的国家级新区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同样差异明显(图 4)。由于

副省部级国家级新区在行政主体构成、管理模式以及对稀缺资源的配置能力及效率等方面均较正厅局级国家级新区具有更大优势,故其理论上将更有利于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然而,实证结果表明,尽管不同行政级别的国家级新区均能够有效地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平均处理效应均大于0),但相较于副省级国家级新区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效应较小且不显著外,正厅局级国

家级新区反而具有更加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事实上,造成这种实际政策效应与理论预期完全相反的原因主要在于副省级国家级新区大多设立于东部地区,由于该地区各省市行政级别普遍较高,各种区域政策试点及推广等也大多优先考虑该地区,这种政策“叠罗汉”现象极易导致国家级新区的“政策边际效应递减”,一定程度上使得副省级国家级新区的政策效应被“低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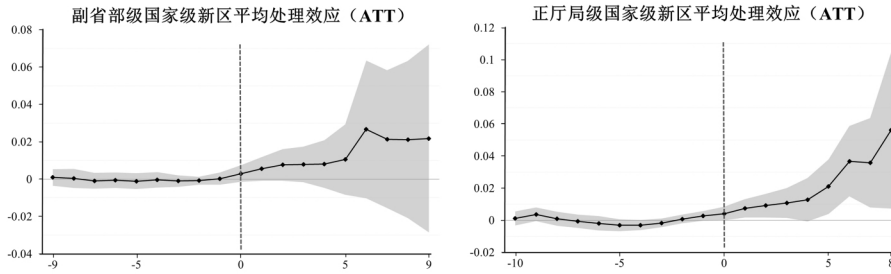


图4 不同行政级别国家级新区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平均处理效应

最后,设立于不同时期的国家级新区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具有明显的时间异质性(图5)。鉴于中共“十八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正式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行动纲领纳入党章,并首次提出建设“美丽中国”,为此后的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实施提供了布局 and 方向<sup>[18]</sup>。因此,本文以2013年为界限,就不同批复设立时间段的国家级新区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异质性展开探讨。实证结果表明,设立于2013年之前的国家级新区的政策平均处理效应整体明显高于后续设立的国家级新区。需要说明的是,导致这种明显政策效应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自中共“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来,为致力于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中国

经历了从“优先追求经济效益”向“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发展理念的根本转变,导致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之对应地出现了短暂的阵痛期;另一方面,考虑到近年来国家级新区“密集化”设立,由于其空间布局不合理和发展陷入传统模式等局限,反而不如早期设立的国家级新区政策效应明显。

#### 4 进一步讨论:国家级新区何以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家级新区究竟通过哪种渠道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对此,本文结合理论机制分析,采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国家级新区通过地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就业结构优化以及生态环境改善等渠道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路径。该模型基本设定为:

$$Y_{it} = \alpha_i + \gamma_t + a SNA_{it} + \beta_k X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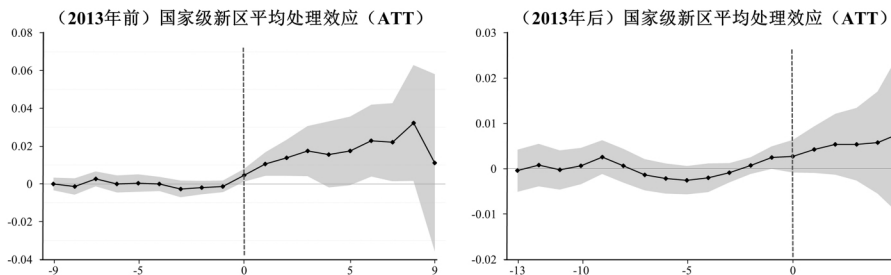


图5 不同设立时间国家级新区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平均处理效应

$$M_{it} = \alpha'_i + \gamma'_i + b_i SNA_{it} + \beta'_k X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2)$$

$$Y_{it} = \alpha''_i + \gamma''_i + a' SNA_{it} + cM_{it} + \beta''_k X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3)$$

其中,  $Y$  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  $SNA$  为国家级新区设立的虚拟变量;  $M$  为中介变量<sup>②</sup>;  $X$  为控制变量, 分别以城镇就业总人数代表劳动力要素、以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代表资本要素、以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代表政府支出、以公路里程数代表基础设施建设、以地区专利申请授权数代表技术进步以及控制城镇化进程影响;  $\alpha$  为个体固定项,  $\gamma$  为时间固定项,  $\varepsilon$  为随机扰动项。一般地, 中介效应为系数  $b_i c$  的乘积。

检验结果见表 3。在控制其他因素基础上, 模型(1)表明国家级新区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在 1% 水平下显著为正(0.0186), 再次说明国家级新区的批复设立的确有利于驱动区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模型(2)至(5)显示, 国家级新区对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不明显, 但却分别在 5% 的水平下对就业结构优化和生态环境改善方面具有一正一负的作用效果。在考虑中介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情况下, 模型(6)估计结果证实国家级新区在 1% 的水平下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为正的直接效应(0.0129)。同时, 就业结构优化和生态环境改善分别在 1% 的水平下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一正一负的影响效应, 地区经济增长在 10% 的水平下具有负向作用, 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则并不明显。总体来看, 相较于地区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并不明显, 国家级新区主要通过就业结构优化和生态环境改善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其中介效应分别为 0.002 和 0.0041。

表 3 国家级新区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检验结果

	(1)	(2)	(3)	(4)	(5)	(6)
	<i>quality</i>	<i>lngdp</i>	<i>indus_str</i>	<i>employ_str</i>	<i>lnso2_e</i>	<i>quality</i>
<i>SNA</i>	0.0186*** (0.0039)	0.0143 (0.0116)	-0.0028 (0.0029)	0.0076** (0.0035)	-0.1213** (0.0485)	0.0129*** (0.0036)
<i>lngdp</i>						-0.0244* (0.0140)
<i>indus_str</i>						0.0133 (0.0574)
<i>employ_str</i>						0.2670*** (0.0475)
<i>lnso2_e</i>						-0.0334*** (0.0033)
<i>_cons</i>	-0.7540*** (0.2277)	0.3292 (0.6720)	0.2481 (0.1689)	-0.5100** (0.2027)	5.6587** (2.8041)	-0.4239** (0.208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i>	551	551	551	551	551	551
adj. <i>R</i> <sup>2</sup>	0.842	0.989	0.757	0.848	0.592	0.873

注: \*, \*\*, \*\*\* 分别表示在 0.01, 0.05, 0.10 水平上显著

### 5 基本结论与启示

以中国 31 省市 2000~2018 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 本文运用广义合成控制法着重探讨了 2010 年来批复设立的 17 个国家级新区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 并采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对其作用机制展开了实证检验, 得出如下结论:

(1) 国家级新区总体能够有效驱动区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 但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总体来看, 各国家级新区自批复设立后, 其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均实现了明显提升, 但具体政策效应大小会受到国家级新区所属地区、行政级别以及设立时间早晚影响。特别地, 设立于东部地区、正厅局级以及 2013 年以前的国家级新区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更为明显。

(2) 国家级新区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

效应具有明显的“政策先行”和持续的政策时效性特征。一方面,自批复设立当年起,国家级新区便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吸引投资以及形成产业集聚等引领示范效应显著地驱动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在国家级新区设立后的8年左右,其均能够持续有效地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其政策效应大小具有先增后减趋势。

(3) 相较于地区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国家级新区主要通过就业结构优化和生态环境改善渠道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其中,就业结构优化发挥了与理论预期一致的正向促进作用;随着以SO<sub>2</sub>排放量降低为代表的生态环境改善程度持续提高,同样有利于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可见,在后续国家级新区的批复设立和推进过程中,一方面,有必要从高质量发展角度出发,不刻意追求单维度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需要重点关注和引导中西部地区的就业结构优化和生态环境改善,以此助力实现中国区域均衡协调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 【注释】

- ①限于篇幅,本文未列出基于多期DID模型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②选取地区生产总值衡量地区经济增长,二三产业产值占比衡量产业结构升级,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衡量就业结构优化,地区SO<sub>2</sub>排放量衡量生态环境改善。

#### 【参考文献】

- [1] 曹清峰. 国家级新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基于70大中城市的经验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 2020(7): 43-60.  
[2] 王志锋, 谭昕, 郑亮, 等. 国家级新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区县数据的证据[J]. 城市发展研究, 2019, 26(6): 122-132.  
[3] 郭志仪, 魏巍, 范巧. 国家级新区对省域全要素生产率变迁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动态通用嵌套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J]. 经济问题探索, 2020(1): 1-9.  
[4] 丘艳娟.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解读[J]. 南昌大学

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51(5): 57-63.

- [5] 李金昌, 史龙梅, 徐蔼婷. 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讨[J]. 统计研究, 2019, 36(1): 4-14.  
[6] 唐晓彬, 王亚男, 唐孝文. 中国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研究[J]. 科研管理, 2020, 41(11): 44-55.  
[7] 聂长飞, 简新华. 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测度及省际现状的分析比较[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0, 37(2): 26-47.  
[8] 晁恒, 满燕云, 王砾, 等. 国家级新区设立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J]. 经济地理, 2018, 38(6): 19-27.  
[9] 齐元静, 金凤君, 刘涛, 等. 国家节点战略的实施路径及其经济效应评价[J]. 地理学报, 2016, 71(12): 2103-2118.  
[10] 吴昊天, 杨郑鑫. 从国家级新区战略看国家战略空间演进[J]. 城市发展研究, 2015, 22(3): 1-10.  
[11] 余子鹏, 田璐. 要素禀赋、产业环境与我国制造业发展质量[J]. 科研管理, 2020, 41(12): 103-111.  
[12] 张平淡, 袁浩铭. 国家级新区设立的效用分析[J]. 经济地理, 2018, 38(12): 1-9.  
[13] 刘继华, 荀春兵. 国家级新区: 实践与目标的偏差及政策反思[J]. 城市发展研究, 2017, 24(1): 18-25.  
[14] Wang J. The economic impact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s: Evidence from Chinese municipalities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3(101): 133-147.  
[15] Abadie A., Gardeazabal J. The Economic Costs of Conflict: A Case Study of the Basque Country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3, 93(1): 113-132.  
[16] Xu Y. Generalized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Causal Inference with Interactive Fixed Effects Models [J]. *Political Analysis*, 2017, 25(1): 57-76.  
[17] 晁恒, 李贵才. 国家级新区的治理尺度建构及其经济效应评价[J]. 地理研究, 2020, 39(3): 495-507.  
[18] 刘耀彬, 郑维伟.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历史形成、逻辑主线及实践创新[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21(1): 68-76.

作者简介: 郑维伟(1997-), 男, 重庆人,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与生态经济。

收稿日期: 2021-03-17



## Theoretical Mechanism and Experience Identification of State-level New Areas ( SNA) Dri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ZHENG Weiwei , LIU Yaobin , LU Haikong

**【Abstract】**Can state-level new areas ( SNA) effectively dri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Is there heterogeneity in its effect? What is the specific influence mechanism? Based on the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the approval establishment of 17 SNAs in China ,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SNA dri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 and uses the generalized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 GSCM) to test its policy effec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NAs have significantly drive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 and the SNAs established in the eastern of China , or with the central bureau level , or before 2013 have the more obvious policy effects. In the meanwhile , the SNAs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in the first year , and last at least 8 years of policy effectiveness. Instead of driving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 SNAs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through two channels: optimization of employment structure and improve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Keywords】** State-level New Area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Generalized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Effect Mechanism

( 上接第 91 页)

## Integrating Property Management into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Path Innovation

DENG Guosheng , CHENG Lingwei

**【Abstract】**As one of the main bodies of urban grassroots governance , property manage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View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perty management subjectivity , this article applies public goods theory and principal-agent theory to analyze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property management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governance. Furthermore , this article proposes an innovative path with regard to the integration of property management into community governance using case studies. That is , high-level , effective property management could be achieved through conceptual innovation ,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uccessful property management in service delivery and governance participation ensures favorable interaction between sociality and publicity in social governance.

**【Keywords】** Property Management; Community Governanc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Path Innovation